

徐道邻致卫德明信里的中德家庭往事

贾长宝

这批信件中多次出现的人名大约有十位,除徐氏之外全部为德国人,他们基本上构成了徐氏留德期间的“朋友圈”。这个圈子的核心是四名男性,无论是在法兰克福还是柏林,他们都形影不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学问上互相勉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述几个家庭的数代人之间一直保持着纵横交错的联结。

徐道邻致卫德明德文信件的价值

2015年笔者动笔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之初,至法兰克福查阅著名汉学家卫德明的档案,无意间见到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分馆馆藏的一批民国法律史家徐道邻致卫德明德文信件。这批信件是该馆“流亡卷宗”(Exilsammlungen)内“卫德明遗藏”(Nachlass Hellmut Wilhelm)的一部分,遗藏号0121,档案编号EB 97/ 284。“流亡卷宗”的全名为“德意志流亡档案(1933—1945)”(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德国国图发起该项目,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对德国知识分子迁移史感兴趣的学者提供资料上的便利。

写作过程中,笔者尽力广泛地搜集和参考了相关的中、英、德文材料。中文出版物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徐道邻妹妹徐樱(1910—1993)女士的《寸草悲》。这部书是对徐家的介绍和回忆,其中,徐樱亲撰的《俺娘》、《先兄道邻事略》和《纪念三哥》三文对徐氏的生平讲得很详细;它还收录了三篇由徐氏德籍妻子徐碧君(Barbara B.E.J.Schuchardt)及其长女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所写的英文回忆文章。其他的中文材料比较零碎,包括:(1)徐氏为《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作的两篇序言(一长一短)里有一些自传性质的内容;(2)在徐氏身后出版的《中国法制史论集》非正文部分,有三篇传记性质的文字,分别是端木恺的《序二》、程沧波的《徐道邻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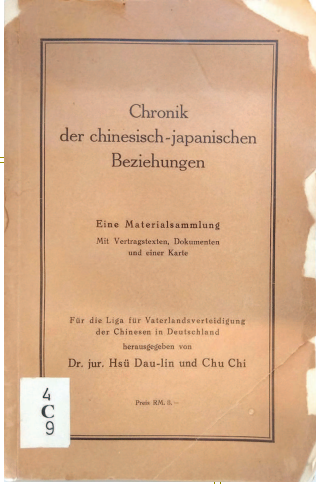
生行述》与徐叶妙暎(徐氏第二任妻子)的《痛定思痛忆道邻》;(3)张充和(1910—2003)因书法和昆曲而与徐氏相交颇深,也留有一些追忆后者的文字。此外国内还有几篇介绍徐氏学术成就的文章,但由于其提供的传记信息不多,就不予详列了。美国学界唯一的传记性讣文发表在1974年的《宋代研究通报》(*Sung Studies Newsletter*)上,里面虽然提及徐氏为《汉学》写稿一事,但却连其博士论文的题目都写错了。2017年以来,徐氏次女徐小玉(Katherine Haas)在The Arundel Patriot网站上陆续发表了一些英文回忆,转述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往事,有一些涉及徐氏在柏林的生活。德文材料虽然同样零碎,史料价值却要更高一些,主要包括:(1)德国教育部档案以及卫礼贤回忆录中有关CIF的内容;(2)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主楼(Jacob-und-Wilhelm-Grimm-Zentrum)内保存的徐氏、卫德明等人的博士论文,以及该校法学院留存的一些学籍资料;(3)1928—1933年的柏林夏洛腾堡区地址簿,以及1931年出版的《大柏林地区犹太人通讯簿》(*Jüdisches Adressbuch für Gross-Berlin*)。需要强调,上列所有文献可作为“徐卫交游”直接证据的只有一项,就是徐氏在西雅图给卫德明写的两首中文诗——这更能说明,这批信件有补阙拾遗的珍贵意义。

除此之外,这批信件至少还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价值:

第一,学生时代的信件,为我们生动地还原了一个深度融入德国社会的中国世家子弟在魏玛时代末期的柏林的留学生活;战后的信件更具文学性,写



约1929年,徐道邻(右)与斯蒂凡·库特纳在柏林合影。转引自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原图称左一为“同学”,笔者参照库特纳1940年的护照照片,确定了其身份)。



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藏《中日关系编年史:材料汇编》(CIF,1931,售价3马克)。作为第一作者的徐道邻已有“Dr. jur.”头衔,说明此时他已获得博士学位。副标题下方记“为在德华人卫国协会而作”。

信人细腻的笔触,不仅揭示了读书人处时代夹缝中无以措手足的茫然与尴尬,而且也折射出以徐、卫等人为代表的“跨国”知识分子在大战之后体会到的幻灭、恍若隔世、心灰意冷等一系列微妙复杂、难以言说的心态变化。前后对比,则为友谊的“情比金坚”作了注脚。

第二,太虚法师1928—1929年游德期间曾多次造访CIF,并在《寰游记》里记录了在CIF任教的几位中国学者的姓名,如丁文渊、郑松堂(1901—1949)、詹显哲(1898—1946)等,但对于留德中国学者在CIF发挥的具体作用,学界一直不甚明了。这批信件不仅能部分回答该问题,而且,透过信文中提到的卫礼贤之死对卫德明前途的影响等情形,我们也能对CIF和《汉学》的运作

模式有直观的了解。

第三,“学术网络”(intellectual networks)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研究题目之一,而这批信件形象地揭示了人际网络与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德国知识分子移民史(特别是交游网络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中国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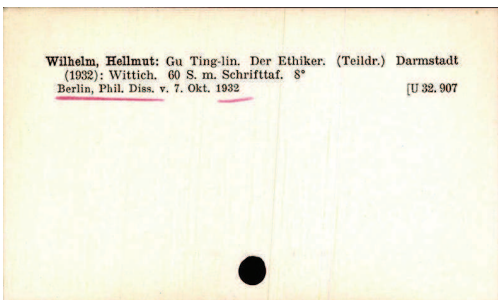
第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映学人之间的友谊、学术与民族政治立场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绝妙案例。蒋复璁称,“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姚从吾、徐氏等留德同学组织了一个抗日委员会,想要在德国宣传日本的阴谋;徐氏还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了德文,希望引起德人注意。受蒋氏回忆的启发,笔者进行了相关的文献检索,发现:1931年,CIF出版了徐氏编撰的小册子《中日关系编年史:材料汇编》(*Chronik der chinesisch-japanischen Beziehungen. Eine Materialsammlung*);次年,徐氏在《汉学》杂志上发表了《满洲问题》(“Das mandschurische Problem”),在《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上发表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满洲铁路政策问题》(“Die japanische kontinentale Politik und das Problem der Eisenbahnpolitik in

der Mandschurei”)。有趣的是,卫德明作为《汉学》主编,不仅亲自撰写学术论文,指出日本对东三省的领土诉求没有任何法律和史实依据,而且,借由刊登徐氏、鲁雅文(Erwin Rousselle)、费舍尔(Eduard Jakob Otto Fischer)等人的文章,他几乎将同年的《汉学》变成了“声援中国”的特刊。诚然,《汉学》的办刊目的之一就是增进中德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但结合这批信件的内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会到,卫德明采取这样的立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挚友的个人影响。

信中所涉主要人物

这批信件中多次出现的人名大约有十位,除徐氏之外全部为德国人,他们基本上构成了徐氏留德期间的“朋友圈”。这个圈子的核心是四名男性,即徐、卫、斯蒂凡·库特纳(Stefan Georg Kuttner,1907—1996)和康拉德·沃尔夫(Konrad Wolff,1907—1989)。他们除了年龄相近以外,身上还有着大量的共同点,比如:来自重要的知识家庭;在柏林大学读博士;最开始的专业为法律;因为民族或政治原因进行了跨越大洋的迁移;从小怀着远大的学术抱负,而且后半生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等等。无论是在法兰克福还是柏林,他们都形影不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学问上互相勉励。该圈子的其他成员主要包括伊尔希(Illich)家的三姐妹、曼弗雷德、库特纳家的两姐妹以及徐氏的德籍妻子。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述几个家庭的数代人之间一直保持着纵横交错的联结。在对信文进行译释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些家庭中与本文相关的成员进行简单介绍。

(1)徐(Hsü)。徐树铮共有子女十人,长成六人,此处只谈长子徐审义(1901—1968)、三子徐道邻(名审交,以字行)与长女徐樱。他们三兄妹受父亲影响,都喜欢昆曲,其中又以审义水平最高。年轻时审义常参与上海徐凌



1932年10月7日,卫德明以论文《道家顾亭林》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上图为该毕业论文在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的原始索引卡。